

吾 廷

集 心 二

魯廷：二心集

无边
二 心 集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九 八 年 · 北 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出版说明

本书收作者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所作杂文二十七篇,末附译文一篇,一九三二年十月由上海合众书店出版。不久被国民党政府查禁。后由书店送交国民党图书审查机关审查,被删二十一篇,剩余十六篇,由书店编为一册,改名《拾零集》,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出版;一九四一年鲁迅全集出版社重印时恢复原貌,此后印行的版本都与初版相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心集/鲁迅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4 重印
ISBN 7-02-001577-8

I. 二… II. 鲁… III. 鲁迅杂文-选集 IV. I21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6412 号

装帧设计: 李吉庆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42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25 插页 2

1980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4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印数 36321—46320

定价 10.50 元

序 言

这里是一九三〇年与三一年两年间的杂文的结集。

当三〇年的时候，期刊已渐渐的少见，有些是不能按期出版了，大约是受了逐日加紧的压迫。《语丝》^[1]和《奔流》^[2]，则常遭邮局的扣留，地方的禁止，到底也还是敷衍不下去。那时我能投稿的，就只剩了一个《萌芽》^[3]，而出到五期，也被禁止了，接着是出了一本《新地》。所以在这一年内，我只做了收在集内的不到十篇的短评。

此外还曾经在学校里演讲过两三回^[4]，那时无人记录，讲了些什么，此刻连自己也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在有一个大学里演讲的题目，是《象牙塔和蜗牛庐》。大意是说，象牙塔^[5]里的文艺，将来决不会出现于中国，因为环境并不相同，这里是连摆这“象牙之塔”的处所也已经没有了；不久可以出现的，恐怕至多只有几个“蜗牛庐”^[6]。蜗牛庐者，是三国时所谓“隐逸”的焦先曾经居住的那样的草窠，大约和现在江北穷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过还要小，光光的伏在那里面，少出，少动，无衣，无食，无言。因为那时是军阀混战，任意杀掠的时候，心里不以为然的人，只有这样才可以苟延他的残喘。但蜗牛界里那里会有文艺呢，所以这样下去，中国的没有文艺，是一定的。这样的话，真可谓已经大有蜗牛气

味的了，不料不久就有一位勇敢的青年在政府机关的上海《民国日报》上给我批评，说我的那些话使他非常看不起，因为我没有敢讲共产党的话的勇气。^[7] 谨案在“清党”以后的党国里，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而不讲，却又为党国的忠勇青年所鄙视。这实在只好变了真的蜗牛，才有“庶几得免于罪戾”^[8]的幸福了。

而这时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之说^[9]，在所谓“大报”和小报上，一面又纷纷的宣传起来，新月社^[10]的批评家也从旁很卖了些力气。有些报纸，还拾了先前的创造社^[11]派的几个人的投稿于小报上的话，讥笑我为“投降”，有一种报则载起《文坛贰臣传》^[12]来，第一个就是我，——但后来好像并不再做下去了。

卢布之谣，我是听惯了的。大约六七年前，《语丝》在北京说了几句涉及陈源^[13]教授和别的“正人君子”们的话的时候，上海的《晶报》上就发表过“现代评论社主角”唐有壬^[14]先生的信札，说是我们的言动，都由于莫斯科的命令。这又正是祖传的老谱，宋末有所谓“通虏”，清初又有所谓“通海”，^[15]向来就用了这类的口实，害过许多人们的。所以含血喷人，已成了中国士君子的常经，实在不单是他们的识见，只能够见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钱的势力。至于“贰臣”之说，却是很有意思的，我试一反省，觉得对于时事，即使未尝动笔，有时也不免于腹诽，“臣罪当诛今天皇圣明”^[16]，腹诽就决不是忠臣的行径。但御用文学家的给了我这个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上是有皇帝的了。

去年偶然看见了几篇梅林格 (Franz Mehring)^[17] 的论

文，大意说，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则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他们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他。我才知道中外古今，无不如此，真是读书可以养气，竟没有先前那样“不满于现状”^[18]了，并且仿《三闲集》之例而变其意，拾来做了这一本书的名目。然而这并非在证明我是无产者。一阶级里，临末也常常会自己互相闹起来的，就是《诗经》^[19]里说过的那“兄弟阋于墙”，——但后来却未必“外御其侮”。例如同是军阀，就总在整年的大家相打，难道有一面是无产阶级么？而且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

自从一九三一年二月起，我写了较上年更多的文章，但因为揭载的刊物有些不同，文字必得和它们相称，就很少做《热风》那样简短的东西了；而且看看对于我的批评文字，得了一种经验，好像评论做得太简括，是极容易招得无意的误解，或有意的曲解似的。又，此后也不想再编《坟》那样的论文集，和《壁下译丛》那样的译文集，这回就连较长的东西也收在这里面，译文则选了一篇《现代电影与无产阶级》附在末尾，因为电影之在中国，虽然早已风行，但这样扼要的论文却还少见，留心世事的人们，实在很有一读的必要的。还

有通信，如果只有一面，读者也往往很不容易了然，所以将紧要一点的几封来信，也擅自一并编进去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之夜，编讫并记。

注 释

〔1〕《语丝》文艺性周刊。最初由孙伏园等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在北京创刊，一九二七年十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随后移至上海续刊。一九三〇年三月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停刊。鲁迅是主要撰稿人和支持者之一，并于该刊在上海出版后一度担任编辑。参看《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

〔2〕《奔流》文艺月刊。鲁迅、郁达夫编辑，一九二八年六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出至第二卷第五期停刊。

〔3〕《萌芽》文艺月刊。鲁迅、冯雪峰编辑，一九三〇年一月在上海创刊，从第一卷第三期起，成为“左联”的机关刊物之一。一九三〇年五月出至第一卷第五期被国民党政府禁止，第六期改名为《新地月刊》，仅出一期即停刊。

〔4〕作者一九三〇年在上海各大学讲演的情况，据《鲁迅日记》，这年二月二十一日、三月九日先后两次在中华艺术大学讲演，三月十三日在大夏大学、三月十九日在中国公学分院、八月六日在夏期文艺讲习会讲演。各次讲稿都没有保存下来。据当时报刊所载消息和与会者的忆述，前四次讲题分别为《绘画漫论》、《美术上的现实主义问题》、《象牙塔与蜗牛庐》、《美的认识》。最后一次讲题不详。

〔5〕象牙塔 原是十九世纪法国文艺批评家圣佩韦（1804—1869）批评同时代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维尼的用语，后来用以比喻脱离现实生活的文艺家的小天地。

〔6〕“蜗牛庐” 据《三国志·魏书·管宁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东汉末年，隐士焦先“自作一瓜（蜗）牛庐，净扫其中，营木为床，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时，携火以自炙，呻吟独语”。

〔7〕指上海《民国日报》登载的一篇短文。一九三〇年三月十八日《民国日报·觉悟》在“呜呼，‘自由运动’竟是一群骗人的勾当”的栏题下，刊载署名敌天（自称是大夏大学“学文科”的学生）的来稿，恶毒攻击鲁迅的讲演，其中有“公然作反动的宣传，在事实上既无此勇气，竟借了文艺演讲的美名而来提倡所谓‘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组织，态度不光明，行动不磊落，这也算是真正的革命志士吗？”等语。《民国日报》，一九一六年一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成为该党机关报，一九二五年末为西山会议派把持，变为国民党右派的报纸。

〔8〕“庶几得免于罪戾”语出《左传》文公十八年：“庶几免于戾乎”。

〔9〕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之说 这是反动派对进步作家的诬陷。“左联”成立后，这类诬陷很多，如一九三〇年五月十四日《民国日报·觉悟》刊载的《解放中国文坛》中说，进步作家“受了赤色帝国主义的收买，受了苏俄卢布的津贴”；一九三一年二月六日上海小报《金钢钻报》刊载的《鲁迅加盟左联之动机》中说，“共产党最初以每月八十万卢布，在沪充文艺宣传费，造成所谓普罗文艺。”新月社成员梁实秋也散布过这类言论，参看本书《“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10〕新月社 由胡适、陈源等人组成的文学和政治团体，详见本书《“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及其注〔2〕。

〔11〕创造社 著名的文学团体。详见本书《上海文艺之一瞥》及其注〔21〕。

〔12〕《文坛贰臣传》 一九三〇年五月七日《民国日报》载有署名男儿的《文坛上的贰臣传——一、鲁迅》，恶毒诬蔑左翼文艺运动，特别对鲁迅进行了集中的攻击和毁谤，如说“所谓自由运动大同盟，鲁迅首先列名，所谓左翼作家联盟，鲁迅大作讲演，昔为百炼钢，今为绕指柔，老气横秋之精神，竟为二九小子玩弄于掌上，作无条件之屈服”等等。

〔13〕陈源（1896—1970）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现代评论派重要成员，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别的‘正人君子’们”，指现

代评论派的其他成员。他们在一九二五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中站在北洋军阀政府一边，攻击鲁迅和女师大进步师生，当时曾被拥护北洋军阀的《大同晚报》称为“正人君子”。

〔14〕 唐有壬(1893—1935) 湖南浏阳人。《现代评论》的经常撰稿人，后曾任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次长，著名的亲日派分子。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二日上海小报《晶报》刊载一则《现代评论被收买?》的消息，引用《语丝》七十六期中有关《现代评论》接受段祺瑞津贴的文字，唐有壬便于同月十八日致函《晶报》辩解，并造谣说：“《现代评论》被收买的消息，起源于俄国莫斯科。”《晶报》在发表他这封信时，以《现代评论主角唐有壬致本报书》为题目。

〔15〕 “通虏”、“通海”，都是所谓“通敌”的意思。宋代的“虏”，指辽、金、西夏等；清初的“海”，指当时在台湾坚持抗清的郑成功。

〔16〕 “臣罪当诛今天皇圣明” 语出唐代韩愈诗《拘幽操——文王羑里作》。皇，原作王。

〔17〕 梅林格(1846—1919) 通译梅林，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著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史》、《马克思传》、《莱辛传说》等。

〔18〕 “不满于现状” 这是引用梁实秋的话。参看本书《好政府主义》及其注〔2〕。

〔19〕 《诗经》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诗歌三〇五篇，大抵是周初到春秋中期的作品，传说曾经过孔丘删订。“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见该书《小雅·常棣》。

目 录

一九三〇年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1
习惯与改革	30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33
张资平氏的“小说学”	37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40
我们要批评家	48
“好政府主义”	51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54
《进化和退化》小引	58
《艺术论》译本序	61
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夜记之五,不完。)	77

一九三一年

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	83
柔石小传	86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90
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	92

上海文艺之一瞥·····	98
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	116
答文艺新闻社问·····	118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119
沉滓的泛起·····	131
以脚报国·····	135
唐朝的钉梢·····	138
《夏娃日记》小引·····	140
新的“女将”·····	143
宣传与做戏·····	145
知难行难·····	147
几条“顺”的翻译·····	150
风马牛·····	154
再来一条“顺”的翻译·····	157
中华民国的新“堂·吉珂德”们·····	160
《野草》英文译本序·····	164
“智识劳动者”万岁·····	166
“友邦惊诧”论·····	168
答中学生杂志社问·····	171
答北斗杂志社问·····	172
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并 Y 及 T 来信)·····	174
关于翻译的通信(并 J. K. 来信)·····	178
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译文,并附记)·····	197

一九三〇年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1〕}

一

听说《新月》月刊团体^{〔2〕}里的人们在说，现在销路好起来了。这大概是真的，以我似的交际极少的人，也在两个年青朋友的手里见过第二卷第六七号的合本。顺便一翻，是争“言论自由”的文字^{〔3〕}和小说居多。近尾巴处，则有梁实秋^{〔4〕}先生的一篇《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以为“近于死译”。而“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就引了我的三段译文，以及在《文艺与批评》^{〔5〕}的后记里所说：“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伪句^{〔6〕}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这些话，细心地在字旁加上圆圈，还在“硬译”两字旁边加上套圈，于是“严正”地下了“批评”道：“我们‘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是无所得。‘硬译’和‘死译’有什么分别呢？”

新月社的声明^{〔7〕}中，虽说并无什么组织，在论文里，也似乎痛恶无产阶级式的“组织”，“集团”这些话，但其实是有组织的，至少，关于政治的论文，这一本里都互相“照应”；关

于文艺，则这一篇是登在上面的同一批评家所作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的余波。在那一篇里有一段说：“……但是不幸得很，没有一本这类的书能被我看懂。……最使我感得困难的是文字，……简直读起来比天书还难。……现在还没有一个中国人，用中国人所能看得懂的文字，写一篇文章告诉我们无产文学的理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字旁也有圈圈，怕排印麻烦，恕不照画了。总之，梁先生自认是一切中国人的代表，这些书既为自己所不懂，也就是为一切中国人所不懂，应该在中国断绝其生命，于是出示曰“此风断不可长”云。

别的“天书”译著者的意见我不能代表，从我个人来看，则事情是不会这样简单的。第一，梁先生自以为“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究竟硬了没有，是否能够，还是一个问题。以硬自居了，而实则其软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第二，梁先生虽自来代表一切中国人了，但究竟是否全国中的最优秀者，也是一个问题。这问题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篇文章里，便可以解释。Proletary^[8]这字不必译音，大可译义，是有理可说的。但这位批评家却道：“其实翻翻字典，这个字的涵义并不见得体面，据《韦白斯特大字典》^[9]，Proletary的意思就是：A citizen of the lowest class who served the state not with property, but only by having children.……普罗列塔利亚是国家里只会生孩子的阶级！（至少在罗马时代是如此）”其实正无须来争这“体面”，大约略有常识者，总不至于以现在为罗马时代，将现在的无产者都看作罗马人的。这正如将Chemie译作“舍密学”^[10]，读

者必不和埃及的“炼金术”混同，对于“梁”先生所作的文章，也决不会去考查语源，误解为“独木小桥”竟会动笔一样。连“翻翻字典”（《韦白斯特大字典》！）也还是“无所得”，一切中国人未必全是如此的罢。

二

但于我最觉得有兴味的，是上节所引的梁先生的文字里，有两处都用着一个“我们”，颇有些“多数”和“集团”气味了。自然，作者虽然单独执笔，气类则决不只一人，用“我们”来说话，是不错的，也令人看起来较有力量，又不至于一人双肩负责。然而，当“思想不能统一”时，“言论应该自由”时，正如梁先生的批评资本制度一般，也有一种“弊病”。就是，既有“我们”便有我们以外的“他们”，于是新月社的“我们”虽以为我的“死译之风断不可长”了，却另有读了并不“无所得”的读者存在，而我的“硬译”，就还在“他们”之间生存，和“死译”还有一些区别。

我也就是新月社的“他们”之一，因为我的译作和梁先生所需的条件，是全都不一样的。

那一篇《论硬译》的开头论误译胜于死译说，“一部书断断不会完全曲译……部分的曲译即使是错误，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而你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末两句大可以加上夹圈，但我却从来不干这样的勾当。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以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气闷，憎恶，愤恨。读了会“落个

爽快”的东西，自有新月社的人们的译著在：徐志摩先生的诗^[11]，沈从文，凌叔华先生的小说，陈西滢（即陈源）先生的闲话^[12]，梁实秋先生的批评，潘光旦先生的优生学^[13]，还有白璧德先生的人文主义^[14]。

所以，梁先生后文说：“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这些话，在我也就觉得是废话，虽说犹如不说了。是的，由我说来，要看“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样，要伸着手指来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的。看地图虽然没有看《杨妃出浴图》或《岁寒三友图》那么“爽快”，甚而至于还须伸着手指（其实这恐怕梁先生自己如此罢了，看惯地图的人，是只用眼睛就可以的），但地图并不是死图，所以“硬译”即使有同一之劳，照例子也就和“死译”有了些“什么区别”。识得 ABCD 者自以为新学家，仍旧和化学方程式无关，会打算盘的自以为数学家，看起笔算的演草来还是无所得。现在的世间，原不是一为学者，便与一切事都会有缘的。

然而梁先生有实例在，举了我三段的译文，虽然明知道“也许因为没有上下文的缘故，意思不能十分明了”。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篇文章中，也用了类似手段，举出两首译诗^[15]来，总评道：“也许伟大的无产文学还没有出现，那么我愿意等着，等着，等着。”这些方法，诚然是很“爽快”的，但我可以就在这一本《新月》月刊里的创作——是创作呀！——《搬家》第八页上，举出一段文字来——

“小鸡有耳朵没有？”

“我没看见过小鸡长耳朵的。”

“它怎样听见我叫它呢？”她想到前天四婆告诉她的耳朵是管听东西，眼是管看东西的。

“这个蛋是白鸡黑鸡？”枝儿见四婆没答她，站起来摸着蛋子又问。

“现在看不出来，等孵出小鸡才知道。”

“婉儿姊说小鸡会变大鸡，这些小鸡也会变大鸡么？”

“好好的喂它就会长大了，像这个鸡买来时还没有这样大吧？”

也够了，“文字”是懂得的，也无须伸出手指来寻线索，但我不“等着”了，以为就这一段看，是既不“爽快”，而且和不创作是很少区别的。

临末，梁先生还有一个诘问：“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翻译之难即在这个地方。假如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那么翻译还成为一件工作吗？……我们不妨把句法变换一下，以使读者能懂为第一要义，因为‘硬着头皮’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并且‘硬译’也不见得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假如‘硬译’而还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那真是一件奇迹，还能说中国文是有‘缺点’吗？”我倒不见得如此之愚，要寻求和中国文相同的外国文，或者希望“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我但以为文法繁复的国语，较易于翻译外国文，语系相近的，也较易于翻译，而且也是一种工作。荷兰翻德国，俄国翻波兰，能说这和并不工作没有什么区别么？日本语和欧美很“不同”，但他们逐渐添加了新句法，比起古文来，更宜于翻译而不失原来的

精悍的语气，开初自然是须“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很给了一些人不“愉快”的，但经找寻和习惯，现在已经同化，成为已有了。中国的文法，比日本的古文还要不完备，然而也曾有些变迁，例如《史》《汉》不同于《书经》^[16]，现在的白话文又不同于《史》《汉》；有添造，例如唐译佛经，元译上谕，^[17]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一经习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现在又来了“外国文”，许多句子，即也须新造，——说得坏点，就是硬造。据我的经验，这样译来，较之化为几句，更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但因为有待于新造，所以原先的中国文是有缺点的。有什么“奇迹”，干什么“吗”呢？但有待于“伸出手指”，“硬着头皮”，于有些人自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不过我是本不想将“爽快”或“愉快”来献给那些诸公的，只要还有若干的读者能够有所得，梁实秋先生“们”的苦乐以及无所得，实在“于我如浮云”^[18]。

但梁先生又有本不必求助于无产文学理论，而仍然很不了了的地方，例如他说，“鲁迅先生前些年翻译的文学，例如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19]，还不是令人看不懂的东西，但是最近翻译的书似乎改变风格了。”只要有些常识的人就知道：“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但同是一种外国文，因为作者各人的做法，而“风格”和“句法的线索位置”也可以很不同。句子可繁可简，名词可常可专，决不会一种外国文，易解的程度就都一式。我的译《苦闷的象征》，也和现在一样，是按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的，然而梁实秋先生居然以为还能看懂者，乃是原文原是易解的缘故，也因为梁实秋先生是中国新的批评家了的缘故，也因为其中硬造